

伊丽莎白·班纳特与夏绿蒂·卢卡斯之比较

——兼析简·奥斯丁的女性意识

杜业艳

(淮海工学院 大学外语教研部,江苏 连云港 222005)

摘要:对《傲慢与偏见》中两位女性人物伊丽莎白·班纳特与夏绿蒂·卢卡斯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对比,阐释了两位出身相似、社会地位相当的女性最后不同归宿的原因。奥斯丁对伊丽莎白这一正面人物的肯定和高度赞扬充分体现了她进步的女性主义意识,这在当时乃至现在都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

关键词:简·奥斯丁;伊丽莎白·班纳特;夏绿蒂·卢卡斯;对比研究;女性意识

中图分类号:II0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07)03-0053-04

英国十九世纪经典女作家简·奥斯丁(1775-1817),两百年来越来越为国内外文坛所瞩目。进入二十世纪后,在多元文化思想的冲击下,奥斯丁作品的复杂性被进一步揭示出来。她的道德观、宗教观、政治观、阶级观、金钱观在现当代评论中都有新的见解。尤其是随着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兴起和发展,奥斯丁小说中蕴涵的独特的女性观也被逐渐发掘出来。作为一名具有敏锐洞察力的女性作家,她对当时社会妇女面临的种种问题有着深刻的感受,对当时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问题也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并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观点。这一点从她的作品《傲慢与偏见》中可以得到印证。作为女性主义尚处于萌芽时期的一位女作家,奥斯丁的作品对于女性主义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奥斯丁生活的时代正是英国工业革命发展、工业资产阶级兴起的时代,也是封建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时代。虽然奥斯丁的生活圈子狭小,但对英国乡村中产阶级生活有深刻了解。她以其细致锐敏的观察力,着重描写了中产阶级家庭的日常生活,从凡人琐事中表现了当时的社会价值观念,她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继承与发扬了英国文学的优秀传统。

同时,奥斯丁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女性备受压

迫和歧视的时代,“妇女们再也没有比在十八世纪那么不受尊重了”^[1],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女性与男性相比在智力上略逊一筹。因此,对女性的教育强调学习才艺而非发展智力。谦卑被看作是主要的妇德。然而,奥斯丁显然持不同意见。她认为妇女天生和男人一样智力发达、有理性。在两性关系中,女人也能扮演指导男性的角色;奥斯丁还相信,知识能力对于女性和男性都同样需要,对女性的教育要把知识放在才艺之上。奥斯丁不能容忍那种认为妇女的美德主要在于顺从的观念。她认为,在社会上,在家庭中,女性应该有与男性同样的权利。顺从与其说是一种美德,不如说是一种对女性的压制。奥斯丁的婚姻观和当时流行的观念也是不一致的。她认为,正当的婚姻关系应是双方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的结合,她从不认同无爱的功利婚姻,但也从未对婚姻持浪漫态度。她曾在给侄女复信中幽默地说:“单身女人易于落入贫穷境地——这可以说是女人所以愿意结婚的一个有力理由。”^[2]因此,奥斯丁认为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而没有经济基础作后盾的婚姻却是愚蠢的。她反对把妻子只当成丈夫的装饰品,强调妇女也有选择婚姻的权利,有享受真正平等、快乐生活的权利。奥斯丁进步的、在当时看来较为激进的婚姻观反映了她对当时社会妇

收稿日期:2007-02-16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4SJD750001)

作者简介:杜业艳(1972-),女,湖北潜江人,淮海工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语教学与英美文学研究。

女命运的关注。

伊丽莎白·班纳特是《傲慢与偏见》中最为光彩照人的女性人物。她天性活泼、聪慧、理智、敏于思考、有洞察力和判断力，更具有一种无畏的反抗精神。小说中的另一位女性人物，夏绿蒂·卢卡斯则是一位典型的传统女性，虽然和伊丽莎白一样敏感而有理性，但她却屈从于社会习惯势力，屈从于命运，与前者形成鲜明的对照。这种对照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对女性自身和婚姻不同的看法。伊丽莎白有敏锐的观察力和判断力，而且勤于接受教育和增长见识，所以，对女性不完整的人格和不平等的地位等问题进行了积极的反抗；而夏绿蒂则习惯于追随旧习俗，热衷于建立舒适的家庭，因此，面对现实生活中的不公视而不见，消极被动地接受。伊丽莎白不屈不挠地与社会抗争，夏绿蒂却一味地谦卑地顺从权势；伊丽莎白追求以爱为基础的平等婚姻，夏绿蒂甘愿为舒适的生活而嫁人。

作为奥斯丁思想代言人的伊丽莎白是奥斯丁十分喜欢的人物。奥斯丁曾谈起伊丽莎白说：“我不知道我该如何能忍受那些不喜欢她的人”^[3]。伊丽莎白的朋友夏绿蒂·卢卡斯，虽和她一样敏感而有理性，但她却是当时普通妇女的代表，屈从于社会习惯势力，屈从于命运。相似的出身，相当的智力能力，相同的社会处境的两位女性最后归宿却有着天壤之别，这主要源于两人对妇女的权利、对爱情婚姻的不同看法和对幸福的不同理解、追求。奥斯丁有意识地创造了这两个对立的典型人物，以便更突出、更生动、更具体地表达她的女性主义思想。这种对立概括起来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伊丽莎白有敏锐的观察力和判断力，而夏绿蒂则习惯于追随旧习俗

奥斯丁的女性意识表现在，她是站在“人”的角度，对女性进行研究，否定男女之间的智力差异。在《傲慢与偏见》中，奥斯丁明确指出，头脑机灵、智力发达不仅仅是男性的特点，愚蠢拙笨、智力低下也并非女性的专利。奥斯丁以“妇女天生和男人一样智力发达，一样有理性”为创作基点，塑造了一位聪慧、理智、敏于思考、有洞察力和判断力，具有独立的自我意识的女性形象——伊丽莎白·班纳特，与夏绿蒂·卢卡斯——这一传统形象形成鲜明的对照。

伊丽莎白的智慧和理性主要体现在她的敏锐

的观察力和判断力上。她一眼就识破彬格莱小姐对吉英·班纳特的假情假意；她看清了柯林斯的愚蠢自负和茄苔琳夫人的专横跋扈；甚至她还痛苦地观察和认识到她所尊敬的父亲身为人父的过失。对待达西的傲慢，伊丽莎白认为他的傲慢触犯了别人的尊严；夏绿蒂却不以为然，居然说：“这么优秀的年轻人，出身好，家境好，样样条件都那么优越，骄傲点也不足为怪，照我说他有权傲慢。”^{[4]235}夏绿蒂的一言一行，无不体现出她的落后观念，屈从于社会的旧习惯势力，对不平等现象无原则地接受。

其次，伊丽莎白勤于接受教育、增长见识，夏绿蒂则热衷于建立舒服的家庭

奥斯丁深感知识能力对于女性的必要性。“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是奥斯丁所不赞成的。她对女性的价值标准予以重新估价。在《傲慢与偏见》中，简·贝内特小姐的温柔、仁爱与恪守妇道和彬格莱小姐的多才多艺、优雅举止和迷人的体态，这些堪称当时妇女美德的品格与伊丽莎白·贝内特相比都相形见绌，更不用说夏绿蒂·卢卡斯。伊丽莎白的一言一行无不体现出奥斯丁心目中妇女美德标准。伊丽莎白勤于增长见识的最为典型的事例是她宁愿看书，也不愿打牌消遣；她看重真才实学，不断自我教育，把才艺放在知识之下。正如她自己所说：“我的手指弹起钢琴来，并不像许多妇女那样熟练……，这是我自己不肯多加练习的缘故”^{[4]109}。她不愿把时间花在才艺的练习上，更不愿以此来取悦男人。因为她认为妇女也应该多读书、长见识。与之相对的是，夏绿蒂从未有过增长见识、自我教育的要求，她所有的心思都集中在怎样寻找一个合适的丈夫和营造一个舒服的家理想上。

再次，伊丽莎白不屈不挠地与社会抗争，夏绿蒂却一味谦卑地顺从

伊丽莎白是奥斯丁笔下最具反抗精神的典型女性人物之一，她面对旧礼教、旧习俗以及封建权贵的压制，大胆而勇敢地捍卫自己的权利和自由，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不顾体统”冒雨步行去探望生病的姐姐的行动就是对社会上种种束缚妇女行动自由的礼教的否定。当时英国社会上流传着一种不成文的陋习，在姐姐出嫁之前，妹妹不能进入社交界。伊丽莎白五姐妹却同时出入社交场合。伊丽莎白一针见血地反驳了咖苔琳夫人的责问，说：“要是因为姐姐无法早嫁，或是不

想早嫁,做妹妹的就不能参加社会和娱乐活动,那实在太苦了她们。最小的和最大的同样享有青春的权利,怎么能因为这样的原因,就叫她们死守在家里!”^{[4]206} 咖苔琳夫人出身贵族,是封建权贵的象征。当她当面羞辱伊丽莎白时,伊丽莎白不畏权势,同这位夫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当面谴责她“浅薄无聊”,认为她无权过问别人的事情。这么一个敢于与旧势力展开面对面的斗争的女性,开创了英国文学史上的先河。

而夏绿蒂的言行则为传统女性的典型。为了丈夫的升迁,为了日后的生活,夏绿蒂处处附和丈夫,对咖苔琳夫人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甘心接受咖苔琳夫人的颐指气使,与伊丽莎白形成鲜明的对照。

最后,伊丽莎白追求以爱为基础的平等婚姻,而夏绿蒂甘愿为舒适生活而嫁人

在婚姻方面伊丽莎白与夏绿蒂的观点更是截然不同。伊丽莎白追求的是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而夏绿蒂想要的仅仅是一个维持生活的“储藏室”。所以,当伊丽莎白对自负愚蠢的柯林斯先生的求婚一口回绝的时候,夏绿蒂却死死抓住这一绝好机会,而且对伊丽莎白说:“我不是个罗曼蒂克的人,我决不是那样的人。我只希望有一个舒舒服服的家。论柯林斯先生的性格、社会关系和身份地位,我觉得跟他结了婚,也能够获得幸福。”^{[5]235} 从而要尽手腕赢得柯林斯,实现她追求舒适生活的愿望。这两位女性都不具有高贵的地位。但她们都希望通过婚姻改变各自的命运,前者几经努力,却一无所获,而后者则抓住机遇,找到一个可靠的“储藏室”。前者或许是浪漫的,但现实击毁了浪漫主义者的幻想,她不得不在现实世界中寻找与她同等层次的婚姻,而后者始终是现实的,她笃信:“大凡家境不好而又受过教育的青年女子总是把结婚当作一条体面的退路。”毫不含糊地把握了生活对她的“恩赐”——这就是当时英国社会的现实,这就是生活的真实。奥斯丁就是这样在她的小说中揭示着现实世界的婚姻真谛。在这等级分明的社会里,许多人希望通过婚姻改变自己的命运,但现实却又让好多人不情愿地只在原有阶层里徘徊,而某些幸运者也只能凭借一份未卜的期望面对今后的生活。

奥斯丁一方面杜撰着她心目中理想的婚姻,将理性的女子嫁给有才华的男子,另一面又极其尖锐地揭示了金钱在生活中的作用。女作家极力

推崇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然而,现实是残酷的,不仅婚姻,一切社会关系都被金钱、地位权势所左右。这正是奥斯丁狭小题材中体现出来的广阔的社会背景和深刻的思想内涵。

当这对好朋友一伊丽莎白和夏绿蒂谈到吉英·班纳特与彬格莱的关系时,两人迥异的爱情婚姻观又凸现了出来。伊丽莎白说:“我看他们彼此之间了解的并不多。”夏绿蒂却回答说:“我诚心诚意祝吉英如愿以偿。我以为即使她明天就嫁给他,她所能得到的幸福,比起她用上一年的时间去琢磨他的性格、再去与他结婚所能有的幸福,并不一定会少到哪儿去。婚姻生活是否美满,完全是机遇。”^[6] 而伊丽莎白坚信正常的婚姻关系应是双方在互相尊重、互相理解、完全平等的基础上的结合。最后,她终于和达西一起获得了理想的婚姻;而夏绿蒂婚姻全部的意义只是占有有一个“储藏室”。奥斯丁给她的理想的女主角以最丰厚的嘉奖:爱情、金钱、社会地位、荣耀……以示对伊丽莎白的肯定与赞扬,从而折射出女作家进步的妇女观和在当时看来较为前卫的婚姻观。

其实在奥斯丁的生活中,爱情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伴其一生,在很大程度上构成其终身未嫁的原因。尽管奥斯丁笔下的“灰姑娘”们或凭自己的聪慧、敏锐过人,或凭真诚、善良的品格,或凭坚定、无私的性格,最后都赢得了“王子们”的爱慕,获得了美好幸福的生活。但据英国作家维拉里·迈尔的传记《倔强的心》所示,奥斯丁本人的境况与其笔下的女主人公十分相似。只有一点不同,现实生活中的奥斯丁远没有小说中人物那样的运气。她终其一生,也没有守候到像《傲慢与偏见》中的达西先生那样年轻富有、才智过人而又风流倜傥的“王子”式人物,倒是经常陷入“爱情与经济保障不能两全”的困境。虽然在现实生活中,作家坚守自己的爱情理想,甚至于终生不嫁,但不能说这种坚守没有困难,没有痛苦。加上年龄渐长,奥斯丁开始意识到理想的爱情离自己越来越远。此时的奥斯丁,对于是否依然坚守自己的爱情理想,内心不能说没有矛盾,没有冲突。传记《倔强的心》中的一段叙述可以证明这一点:一八零二年十二月,在一位朋友家逗留期间,二十七岁的奥斯丁曾经答应这位朋友的弟弟——比格·威瑟先生的求婚;经过一晚的考虑后,又于第二天清晨“泪流满面”地取消了这次婚约并匆匆离去。原来,这位比格·威瑟先生虽然富有,但在“才智

与修养方面永远无法与简·奥斯丁相提并论”。由这一事实推断,简·奥斯丁在自己青春的尾声阶段,曾经试图放弃自己的爱情理想,想与《傲慢与偏见》中的卢卡斯小姐一样,嫁一个“食物贮藏室”了事。这段插曲说明了奥斯丁对“一个自己的家”,对“安定的、有经济保障的生活”的迫切需要,也说明了现实带给她的失望是多么强烈。而从奥斯丁答应比格·威瑟先生求婚后的那个“不眠”之夜可以断定:在奥斯丁的内心深处,坚守爱情理想的要求与放弃这一理想,“嫁一个‘食物储藏室’,获得安定的有经济保障的生活”的强烈欲望之间构成了一种永恒的、不可解决的矛盾冲突。这种内心的矛盾冲突最后以前者的胜利而告终,以其一直坚守的信念和理想的胜利而告终。因此,奥斯丁有意地创造与肯定了伊丽莎白这一正面的典型人物,以圆其在现实生活中未圆之梦。

从对伊丽莎白和夏绿蒂的比较中我们不难发现伊丽莎白是奥斯丁心中的理想;而夏绿蒂则是生活的真实。伊丽莎白不仅是《傲慢与偏见》中令人着迷的女性,而且也是19世纪的小说中最为光彩夺目的女性形象之一。她的聪慧、机智、自信、自尊与作者是相似的;但她的幸运的爱情和完

美的婚姻,却是简·奥斯丁寻求而不得的梦。于是在小说这个超现实的世界里,作者让她最钟爱的女主人公得到了梦中的“王子”,过上了幸福的生活。面对情感问题,她决不会像莉迪雅那样凭生物冲动而草率行事,而是凭借思考和理性的力量保持了人的尊严。她面对现实,不像夏绿蒂那样完全放弃对情感的追求。伊丽莎白体现出一个健全人的全部本质力量。她对婚姻的选择也体现了奥斯丁的婚姻观及婚姻理想。

同时,这一比较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女性自身和爱情、婚姻问题,因为正是当时社会的传统造成了妇女低下的社会、经济地位,从而产生了那条举世公认的真理,即“有财产的单身汉需要位太太”^[5]¹⁵⁸。奥斯丁试图探索出一条解决妇女问题的路子来,因此在十八世纪,她就在作品中表达了自己的女权思想。虽然从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她的想法太过柔和,还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她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在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和捍卫自身权益过程中所做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即使在妇女解放思想广为流行的今天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 Monaghan, David. Jane Austen and the position of women[M]. See David Monaghan, Ed. *Jane Austen in Social Context* [M]. London: Macmillan, 1981:105.
- [2] Lefroy Helen. 1997, *Jane Austen*[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 Research Press, 2002:164.
- [3] Mudrick, Marvin. *Jane Austen: Irony as Defense and Discovery*[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2:267.
- [4] Austen, Jane. *Pride and Prejudice*[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 Research Press, 2006.
- [5] [英]简·奥斯丁. 傲慢与偏见[M]. 王科一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
- [6] Austen, Jane. *Pride and Prejudice*[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 Research Press. 2006:158.

Comparative Study on Elizabeth Bennet and Charlotte Lucas ——A Tentative Analysis of Jane Austen's Feminist Consciousness

DU Ye-yan

(College English Department, Huaiha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Jiangsu Lianyungang 222005, China)

Abstract: The article conduct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lizabeth Bennet and Charlotte Lucas in *Pride and Prejudice* from a feminist perspective. And it analyzes the reasons that lead to the different marriages between these two women with so similar family birth and social status. It is not difficult for us to perceive Austen's affirmation and approval of Elizabeth, who definitely embodies Jane Austen's progressive feminist ideas that are of profound and everlasting social significance.

Keywords: Jane Austen; Elizabeth Bennet; Charlotte Lucas; Comparative Study Feminist; consciousness;